

第十届中国(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节

水浒文化旅游高峰论坛发言

(摘编)

编者按：8月26-28日，第十届中国(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节水浒文化旅游高峰论坛在我县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浒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和文化旅游研究专家学者云集梁山，共同探讨交流水浒文化，共谋水浒文化旅游发展大计，十一位专家学者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演讲嘉宾围绕《水浒传》忠义文化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水浒文化与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忠义思想与新时代的梁山精神等作了精彩的发言。梁山是水浒故事发生地和水浒文化研究基地，水浒文化是我县最亮的品牌和最大的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弘扬水浒文化、传承忠义精神，建设忠义文化示范区，促进水浒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县委、县政府发展战略之一。作为梁山人，人人都要读水浒，爱水浒，争做新时代的梁山好汉，特别是全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了解水浒文化、研究水浒文化、弘扬水浒文化，倡树“忠义仁孝、诚信友爱”的梁山精神，打造浓厚的水浒文化研究氛围，真正把梁山变成引领水浒文化研究的龙头和高地，形成品牌效应，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和经济社会事业共同进步提供文化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本报自即日起，将陆续刊发水浒文化旅游高峰论坛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摘编，供大家交流研讨，敬请关注！

专家简介



李文学，原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少将军衔、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书画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忠义为立身之本”是梁山好汉的突出品格，水浒英雄们也被研究者们称为“成也忠义，败也忠义”。“忠义”思想为水浒文化打上了核心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忠义”文化。“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经典思想里，“忠”指的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当时并不分对上与对下。“义”则是指“事之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为了防止这种“义”的观念越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轨”，朝廷的谋臣策士们便有意在“忠义”二字连缀上下功夫，努力把臣民之间的结义，控制在为朝廷尽忠的政治框架内，努力用“忠”来诱导“义”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石破天惊的诱导下，最终被朝廷招安的悲剧所在。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们的“忠义”思想中，“忠君”、“招安”思想等是封建糟粕，应该扬弃。但这毕竟属于历史的局限，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分析、客观看待。不可否认，在学术领域，有人对“忠义”思想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但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忠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看成褒义的。历史上的许多“忠义”之士是被世人所推崇、所赞颂的。新时代的“忠义”，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思想内涵，是值得提倡和褒扬的道德理念。由此我想到，**梁山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建设“梁山忠义文化示范区”、创响“水浒故里、忠义梁山”文化品牌，还是很有些政治见地和学术勇气的。**

忠肝义胆是梁山文化性格的历史积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泊梁山这片积淀着厚重水浒文化的英雄热土，养育了文化性格鲜明的梁山人。这种文化性格，就普遍意义上讲，是以忠肝义胆为鲜明特征，这是对水浒“忠义”文化的科学扬弃和批判继承。即摒弃“忠君”、“招安”等封建效力朝廷。这也正是梁山英雄们难以跳出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石破天惊的诱导下，最终被朝廷招安的悲剧所在。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们的“忠义”思想中，“忠君”、“招安”思想等是封建糟粕，应该扬弃。但这毕竟属于历史的局限，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分析、客观看待。不可否认，在学术领域，有人对“忠义”思想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但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忠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看成褒义的。历史上的许多“忠义”之士是被世人所推崇、所赞颂的。新时代的“忠义”，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思想内涵，是值得提倡和褒扬的道德理念。由此我想到，**梁山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建设“梁山忠义文化示范区”、创响“水浒故里、忠义梁山”文化品牌，还是很有些政治见地和学术勇气的。**

海之内皆兄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
新时代梁山“忠义”文化“忠诚信义”的积极内涵，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梁山“忠义”文化与时俱进，更彰显了“忠诚信义”的积极内涵和时代风采。其“忠诚”，突出了对党、对领袖、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贞诚实；其“信义”则突出了信用、道德和正义，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绳。这与梁山民众主流意识中，对“尽心于为国，事宜在济民”的“忠义”文化内涵之认定，是一脉相承的。新时代梁山“忠义”文化所彰显的“忠诚信义”的时代风采，对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是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的。
我们今天讨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提倡所谓的“忠义之士”，是摒弃了宋江忠君、招安等封建糟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忠义”思想。**我坚定地认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是积极的，有益的，应该在开发梁山资源、弘扬水浒文化中，不断加以完善、光大。**

专家简介



李永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水浒学会会长。

《水浒传》的成书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水浒传》的忠义思想也是由时代积累而逐渐形成的。罗贯中虽然舍弃了《施本》功成名就、封妻荫子大团圆结局的老套路，但他却完全接受了施耐庵等人强化宋江忠义思想的思路。从他对宋江的全部描写来看，他是在层层递进要将宋江塑造成一个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典型。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情节场面，都是在步步推进、强化对宋江这一忠义形象的塑造。在招安实现，被朝廷调派率大军征讨辽国入侵后，作品描写宋江的忠义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即在在外御敌时忠心报国。当辽国欧阳侍郎以弃暗投明，并赠以金银骏马，委以高官重权，企图诱劝宋江弃宋投辽时，宋江坚定地表示：“吾辈当尽忠报国，有死而已”，又说：“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宋江坚持了忠心报国的爱国思想和民族大义。这是罗贯中塑造的宋江忠义形象最闪光的一笔，也是宋江掷地有声、正气凛然的语言。
从以上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出，忠义思想始终是伴随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而发展的。易言之，宋江忠义思想从无到有，从淡到浓，直到丰满、强烈，甚至发展到极致的过程，也就是施耐庵特别是罗贯中加工再造《水浒传》成书的全过程。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罗贯中并非为塑造忠义形象而塑造忠义形象。他“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做话头”（作品第一百回结语诗），他是要借忠良人物做话题，描写这一集忠义仁孝于一身的英雄的毁灭，揭露最高统治的阴谋毒辣，以此来警醒世人。这就是他的全新的创作构思，也是作品主导的思想倾向。
通观全书，我们也看到，作家罗贯中是赞同宋江有气度、有气度的接受招安，归降朝廷，忠心报国的。但作者又不赞同对朝廷效忠到底，认为那条道路凶险莫测，而倾向功成身退。但是这样描写与宋江效忠到底的性格逻辑相违背，与罗贯中本人借“忠良”的被毁灭揭露最高统治者残忍、毒辣的罪行的主旨相抵牾，况且作者也不想也不愿设置一个四平八稳、平淡平庸的结局，更拒绝重蹈功成身退、荣归故里大团圆结局的老路。因此，他就不得不怀着矛盾的心情，按照宋江的思想性格的逻辑一路写下去，成其志，完其节，让他效忠思想发展到顶峰、极致，最后仍遭最高统治集团的毒手。用这一怵目惊心、鲜血淋漓的图景，无情地暴露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残忍、毒辣的本性、本质。为人们总结出了忠臣良将与最高统治集团关系的沉痛教训：封建统治者阴谋毒辣，不可信赖，痴迷功名富贵凶多吉少；对最高统治者效忠到底必然发生悲剧。

《水浒传》最后定稿成书于六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它表达出的思想观念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观念迥然有别。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一方面要发扬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吸取其精华因素，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古代作品存在的时代性的局限和糟粕成分。以《水浒传》而论，书中描写的权奸显贵、邪恶势力的恶德、恶行固然为我们坚决反对和批判，即使正面人物的迷信、开黑店、滥杀无辜、任意施行暴力，以及作品夹杂的色情描写等等，这类陈旧、落后的思想行为也必须摒弃。而对作品中描写的人间借老怜贫、扶危济困、孝敬父母等显示的古代人民的优秀品质，则应当继承和发扬。尤其是作品描写的，在外敌入侵，大兵压境，国家民族危存亡之秋，挺身而出，尽忠报国，誓死杀敌，不为任何威逼利诱所动，坚持凛然不屈的民族大义，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优良品质，在今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

专家简介



王平，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

后的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的过程。梁山义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梁山事业蒸蒸日上，势不可挡。正是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梁山好汉金伙接受了招安。这样一种文本构成是以往任何有关水浒故事所没有的，因而也最可看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无论是宋人的野史、笔记，还是元人修的史书，无论是民间传闻，还是元杂剧，宋江一伙或是被擒，或是投降，或是无奈接受招安，但都没有在大胜官军的前提下主动争取招安。再看一下紧接着的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小说写定者的意图非常明确，即肯定梁山好汉接受招安是为了“护国安民”，以梁山好汉的委曲求全来反衬朝廷奸佞的可怜可恨，从而突出了忠奸之争。百回本《水浒传》去田虎、王庆而存征辽、平方腊，其用意也值得认真研究。按照李贽的说法，破辽、平方腊是生活在元代的施罗二人由于“实愤宋事”才编写出来。这一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认真想来，既然已生活于元代，为何又“实愤宋事”呢？实际上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去田虎、王庆而存破辽、平方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调梁山好汉以“护国安民”为宗旨，并且将之付诸实际行动。

总之，《水浒传》的文本构成直接决定着其意义。应该说金圣叹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腰斩《水浒传》，正是基于这一点。按照金圣叹的意见，让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破辽、平方腊，就是“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就是宣扬强盗也有忠义，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因此他要删掉七十一回之后的内容全部删掉。也就是说，要想改变百回本《水浒传》的题旨，必须改动其文本，这不恰好说明了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其意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吗？这种关联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对已有故事即各位好汉上梁山的行迹，写定者竭力强化其义气的内涵，或纳入英雄豪杰屡遭嫉妒迫害的框架之内；二，对全书的文本构成，写定者鲜明地以“忠奸之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尽管这两个方面磨得还不那么理想，以至于造成了对其意义诠释的分歧和争议，但只要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其文本的构成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还是不难把握的。

百回本《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也是变化丰富的。宋江不仅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首领，而且也是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在《水浒传》中，宋江上梁山的道路却比任何人都更加艰难。《水浒传》对宋江被迫上梁山的描写，显然是要突出宋江的忠孝。小说对宋江结局的安排，更可见出小说写定者的用意。小说没有选择宋江被擒或投降等记载，而是选择了宋江受招安、平方腊，并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改动。一，宋江不是被动接受招安，也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而是在节节胜利、大败官军的情况下主动争取朝廷招安。二，接受招安后，成为朝廷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是征辽、平方腊的主力军。三，屡立战功，结果反被朝廷奸佞毒害而死。这些改动尤其是最终的悲剧结局，寄托着小说写定者的深刻用意。不仅从客观上否定了接受招安，也不仅表现了忠奸之争，而且从本质上揭示了社会现实的残酷。这种揭示体现了《水浒传》写定者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明代对宋江“忠义”的充分肯定：汪道昆《水浒传》序从三个方面肯定了宋江的所作所为：一是能够率众梁山众人，“始终如一”，“必非庸碌人也”，也就是说宋江是一位难得的将帅之才。这是从能力上对宋江的肯定。二是宋江之所以“啸聚山林”，乃是“为庸吏所迫”。同时又出于对朝廷内忧外患的现实和不肯屈服于辽金异族侵略者的考虑。这是从道义上对宋江的肯定。三是虽然落草为寇，但“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这是从人品上对宋江的肯定。既然宋江完全是一位正面人物形象，那么，以他为首的梁山好汉当然也就不是强盗。他又以孟子的观点为据，证明梁山众人不过是“窃钩者”，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诚窃国之大盗也”。甚至认为“道君为国，一至于此，北轶之辱，固自贻哉！”为梁山好汉叫梁山林作了辩解。从万历十七年（1589）的“天都外臣”到崇祯年间的杨明琅，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众多论者的观点如此一致，远非个人好恶所可解释。他们出于对奸佞把持朝政的憎恶，反过来推许宋江等人的抗争。他们出于对朝廷文臣武将皆无能之辈的失望，反过来称颂宋江等人的能力。一句话，他们是把宋江等人当作正义与能力的代表来看待的。

(县水浒文化研究院供稿)